

文史 活页



2025

第一期
总第三十二期



淮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委 编印



黄江书法作品《听风》

征稿启事

《文史活页》是淮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委文史资料征集与发布的平台。欢迎各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按政协文史资料的“三亲”性要求，撰写或提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与地方改革发展事业及政协工作相关的文史资料，或提供有价值的采编线索。有关资料、稿件一经采用，即奉薄酬。

联系电话：83900530

联系人：朱慕雯 朱维明 陈瑾

印 数：1000 册

印刷单位：江苏农垦机关印刷厂有限公司

发送对象：省政协有关领导、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设区市政协文化文史委，淮安市四套班子领导，市政协各委办公室、市直有关部门单位，各县（区）政协文化文史委、各文史阵地，市政协特邀文史委员等。



曹启瑞绘画《春之韵》

准印证号：S（2025）08000026

出版日期：2025年2月26日

内部资料 免费阅读

编者的话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文史活页》特别推出一期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淮宝县曹王庄（今淮安市洪泽区朱坝街道曹庄村）一带抗大四分校的专题文稿，回忆和记述当年的一些历史情况与感人故事。

抗大四分校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四分校的简称。淮安市新四军研究会会员、洪泽区朱坝街道通讯员王生标，从 1996 年以来一直关注、探寻抗大四分校在洪泽一带的线索和资料，多次前往四分校驻址曹王庄，寻找遗迹、遗物，挖掘史料。他还同地方文史专家一起，奔赴全国各地寻访当年的老学员、老战士及其家人，拜访历史知情人士等，获得大量宝贵的资料。

本期《文史活页》选编了王生标撰写的几篇重要文稿，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抗大四分校在淮安的这一段历史，从而激发大家为建设美丽幸福新淮安而贡献力量！

目
录

抗大四分校的前世今生.....	/ 1
抗大四分校曹庄村记事.....	/ 13
抗大四分校在淮宝县种田办工厂.....	/ 17
抗大四分校被服厂寻踪.....	/ 23
24 名日军战俘与抗大四分校.....	/ 28
追忆彭雪枫师长.....	/ 35
拂晓剧团老战士成长中的故事.....	/ 43
超凡脱俗的母爱.....	/ 49
抗大四分校陶林间谍案.....	/ 59

编
委
会

主 任	毕丰书 徐效文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继峰 刘志平 朱维明 朱慕雯
	陈 瑾 周忠跃
编 审	马继峰
主 编	刘志平
编 辑	朱慕雯 朱维明 陈 瑾

抗大四分校的前世今生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一所培养军政干部的学校。1936年6月1日在陕北创建，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20日，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学校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1939年后挺进华北敌后办学，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各主要根据地先后创办10多所分校，培养了10多万名优秀的干部。抗战胜利后，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总校及分校相继改建为战略区军事政治大学，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大四分校的诞生

抗大四分校的前身是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1938年11月下旬在河南省睢杞太地区成立，先后办学四期。193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原局应动员豫

西鄂北的大批忠实青年去彭雪枫部开办千人左右之学校，雪枫在当地应注意招收半知识分子。”“北方局应立刻准备从抗大本校及一、二两分校拨出学生 700 人妥慎地送往雪枫处。”根据党中央指示，新四军游击支队党委决定将第四期的随营学校扩建为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一部分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学员留抗大四分校继续学习。

1940 年 3 月 18 日，抗大四分校在河南省永城县李寨镇麻冢集正式诞生，并在支队司令部驻地新兴集“精中堂”举行了学校成立大会暨第一期开学典礼。支队和豫皖苏边区领导同志彭雪枫（兼校长）、吴芝圃（兼副校长）、张震、肖望东（兼政治部主任）等出席了大会。教育长开始为刘作孚，不久被调离，由方中铎接任。



抗大四分校学员在露天课堂上课

抗大四分校驻地麻冢集，离日伪据点只有 20 多里路，常常可以听到炮声。学校无校舍、无桌凳，只好借用民房。上课

在大树底下。干部学员以高粱、谷子、红薯为主食，吃窝窝头、喝稀粥，少油缺盐，生活非常艰苦。课程设置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和游击战术、步兵战术、兵器常识、射击、投弹等军事知识。由于缺少专职教员，支队党政领导同志都到学校讲课。

第一期学员于1940年8月18日举行了毕业典礼。学校对学员作了全面鉴定，发给毕业证书。除根据地形势需要，已分配400余人外，毕业时还有学员600余人。

在转移中办学

1940年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豫皖苏局势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形成三面包围之势，摩擦一触即发。险恶形势下，学校由麻冢集转移到安徽省涡阳县北吴桥寺、牌坊集。

11月7日，在牌坊集举行了第二期开学典礼。学员有部队选送的连排级干部，有地方党政干部，也有招来的知识青年。编为两个大队，一大队为军事队，辖一、二、三中队；二大队为政治队，辖四、五、六中队；还有一女生队。张明河任校政治部主任。

12月中旬，日伪军“扫荡”豫皖边地区，学校转移到河南省永城西鄆城一带。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学校再次奉命转移，便于应

变。2月12日，在风雪中渡过涡河后，学校进驻周圩子，彭雪枫校长到校视察。

国民党调集9个师14万人，企图一举围歼重组后的新四军四师主力。日伪为了逼蒋投降，于1941年1月下旬兵分三路发动了“豫南战役”，使新四军处于日、伪、顽夹击的被动局面。学校于2月下旬，由涡河以南转移到涡河以北。其间，由于对敌斗争形势严峻，学校分为3个工作团（梯队），分散进行扩军筹粮等活动。

5月8日，到达皖东北根据地鲍集（今淮南市盱眙县鲍集镇）一带进行休整。

6月5日，学校奉命离开鲍集，向洪泽湖西转移，经3天行军，于7日到半城附近的孙园。宿营休整后，从洪泽湖北高嘴子乘船，经高良涧、蒋坝、三河（今洪泽区境内），于19日到达盱眙县永丰镇，一面继续整顿，一面完成未完成的教学任务。

8月13日，学校奉命自永丰镇出发，16日到达半城镇附近的祖姚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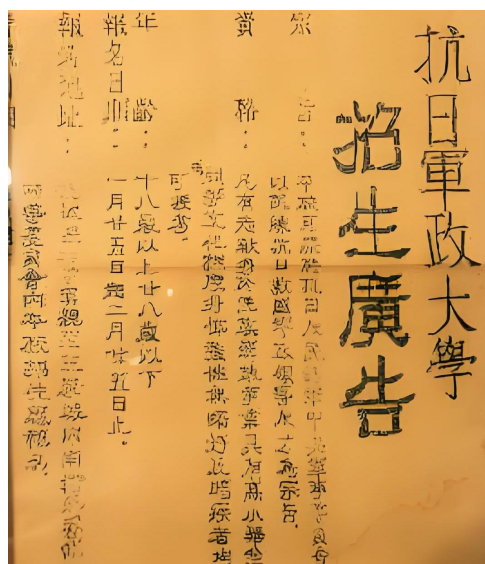
8月30日，第二期学员在祖姚庄运动场举行毕业典礼。彭雪枫、邓子恢以及苏皖边区党政领导同志出席，彭雪枫、邓子恢发表讲话。这期学员到毕业时尚有400余人，被分配到部队和地方工作。

9月下旬，师部从部队抽调了80名营团干部，组建一个干部队送校培训，该队属于第三期。10月27日，在祖姚庄举行

了开学典礼。彭雪枫校长、邓子恢政委和区党委书记刘子久都到会上讲了话。这期学员编为6个中队：两个军政干部队，一个地方干部队，一个部队领导干部队，一个女生队，一个青年队，校部直接领导中队工作。10月底，任命孙叔平为训练部副部长，主持训练部工作。11月，军部调邱一涵同志到校任政治部组织科长。

在淮宝开设普通科

1942年1月，学校在淮宝抗日根据地内张贴招生广告，招收男女青年，创办普通科。2月底，首批录取学员200余人到校，正式开学。周子平、刘建功、杜月凯3名同志为主任，分别主持普通科的军事行政、政工和政治教育工作。



抗大的招生广告

普通科作为抗大的预科，以文化学习为主，设语文、数学、地理、政治、军事五门课。学期暂定3个月，首批学员因战争情况，实际学习了1年。普通科开始设在淮宝县岔河西南孙夏

庄，不久迁到该县袁家三门和四门，后又迁到该县高良涧。后来，曾到洪泽湖西校部短时间学习，33天反“扫荡”开始后，又随学校迁到湖东淮宝县赵家集，直到1943年3月毕业。

1942年2月4日，学校在泗南县鲍集隆重举行第三期学员毕业典礼与第四期开学典礼，彭雪枫校长、张震副校长、肖望东主任到校参加典礼。

第四期学员共编为六个中队，包括四个军政干部队，一个青年队，另外，还有200余人的普通科。上海来的一部分女生，编一个女生班，附设在二队（政治队）学习。

6月初，为防敌人的突然袭击，学校奉命南移洪泽湖西岸鲍集。7月19日，重新回到祖姚庄。

奉命东渡洪泽湖

1942年11月15日，为粉碎敌伪“扫荡”，跳出包围圈，学校向洪泽湖东转移。在淮宝县朱坝以南、盱眙县永丰镇一带，以学员队为单位，分散开展教学活动。

由于国民党韩德勤趁日军扫荡之机，率部占领淮北抗日根据地山子头核心地带，原担任淮宝防务的新四军二师五旅调往洪泽湖西参加战斗，抗大四分校奉命接管淮宝防务。1942年12月20日，学校移驻淮宝县曹王庄（今洪泽区朱坝街道曹庄村）一带。



1943 年，抗大四分校政治部部分干部于淮宝县曹王庄合影。后排左起三人为卢华、邱一涵、陈锐霆

12 月 30 日，学校进行第二次精简，重点是压缩机关。学校对外番号称“独立团”，校长称“团长”，并对所属部门、干部称谓进行相应调整。

1943 年 1 月 17 日，为了加强学校的领导，陈锐霆奉命任副校长，并兼任淮宝县委书记，实行一元化领导。

8 月 1 日，第四期三、四队学员毕业，第五期开学，在曹王庄校部举行大会。陈锐霆副校长主持大会，彭雪枫校长参加大会，并作重要讲话，淮宝县党政领导同志和来宾也在会上讲了话，学员代表致答谢词。当晚和 8 月 3 日晚，拂晓剧团还到场表演文娱节目，受到大家的欢迎。

12 月 19 日，除三、四中队在 8 月份毕业外，第四期学员在曹王庄毕业。彭雪枫校长特从淮南赶来参加毕业典礼。



抗大四分校毕业证章

返回洪泽湖西

1944年9月3日，新四军四师主力西进后，学校驻地由洪泽湖东的曹王庄转移到湖西半城附近的杜巷、张塘。9月下旬，第六期学员举行开学典礼。

11月，第五期学员在洪泽湖西校部驻地杜巷毕业。这期学员从1943年8月起，经过1年零3个月学习，其原因是参加了整风学习，写历史自传，时间延长了。

学校在五期和六期之间，还开办了地方干部队，每期学习半年时间，为地方政府和地方武装培训了一批干部。

12月，校领导作了调整，因彭雪枫师长当年9月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战斗中以身殉国，新任新四军四师师长张爱萍兼校长，邓子恢兼政委，张震参谋长兼副校长，陈锐霆调离学校，

冯文华任副校长，邱一涵仍任政治部主任，孙叔平改任校务部长。

改名“雪枫军政大学”

1945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政治部作出《关于纪念彭雪枫同志的决定》，宣布将抗大四分校改名为“雪枫军政大学”。

4月20日，学校的一、二大队学员在杜巷举行毕业典礼。这是抗大四分校的第六期学员，也是“雪枫军政大学”的第一期。邓子恢政委到校参加毕业典礼并讲话。

11月，在校学员均分配到部队工作。学校的大部分教职人员，于11月25日由政治部主任邱一涵率领进驻淮安城郊河下镇待命。

抗大四分校（包括雪枫军政大学）历时5年零8个月，为新四军和地方党政机关培养近5000名军政干部，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开启新征程

1946年3月15日，学校由河下转移到高邮县界首镇。4月，根据华中军区指示：雪枫军政大学、苏中公学、华中野战军随营学校合并，成立“华中雪枫大学”，由粟裕兼任校长，

开始了新的历史使命。

11月25日，由华中雪枫大学、山东军区军政学校、东江纵队以及淮南随营学校和山东军区通信学校等5个单位统一改编为“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并在山东省莒南县大店举行了学校成立大会暨第一期开学典礼，华东军区副司令张云逸兼任校长，余立金、曾生任副校长。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的诞生，翻开了抗大四分校发展史新的一页。学校汇聚从珠江、长江到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教育资源，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教学力量，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先后培养输送了2万多名师以下各级军政干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宝贵的人才支持。

1949年7月，解放军胜利结束渡江战役，宁、沪、杭等大城市迅速解放，新中国的诞生指日可待。为了加速军队干部队伍建设，中央军委决定：将华东军事政治大学与三野军政干校合并，正式成立新的“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并任命陈毅兼校长和政治委员，陈士榘任副校长，钟期光任副政治委员。同年10月18日，在南京孝陵卫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全校教职员工达3.7万余人，先后为国家输送近5万名军政干部。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充分肯定。1950年6月20日，毛主席为华东军政大学题词：“华东军政大学日进有功，培养大批国防建设人才。”朱德总司令也题了词：“努力学习军事科学和革命理论，为建设近代化的强大国防军而奋斗。”

1951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以华东军政大学主体

部分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高级步兵学校”，由余立金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刘清明、高锐任副校长。“三高”开办不到一年时间，聂荣臻、粟裕向军委提议，将当时已有的5所高级步兵学校组建为一所总高级步兵学校，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批准。

1952年5月2日，“三高”升格组建“总高级步兵学校”，主要担负全军步兵营、团职军政指挥员培训任务。1953年1月7日，毛主席亲自为“总高”题写训词，为学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叶剑英等先后亲临学校视察、指导。学校先后3次组织方队参加首都国庆阅兵，展示“总高”建设成就。这个时期，学校共为部队培训了5000多名团、营职军政干部，许多学员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

1957年高等军事学院和一些军兵种院校相继成立后，军事学院留下的3个系，于1959年2月18日，与“总高”步兵学校合并，成立“南京军事学院”。“总高”成为该院的办学主体，主要担负中级指挥军官、参谋军官和外军留学生的培训任务。廖汉生、刘浩天、张震先后担任学院院长，钟期光、王平先后任政治委员。1969年2月，学院撤销。

1978年1月12日，为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恢复军队院校的重要指示，在南京军区军政干校基础上，恢复组建“南京高级步兵学校”，直属于中央军委，主要培训营、团职军政干部，张荣森为校长，丁秋生为政委。任务和编制体制也作了

较大调整。1986年6月9日，学校改称为“陆军指挥学院”，直属于总参谋部，成为全军唯一的一所陆军中级指挥院校。1992年1月30日，江泽民同志为学院亲笔题词：“学习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解决新时期军队建设和未来作战问题。”

抗大四分校曹庄村记事

抗战时期，新四军二师五旅和抗大四分校曾驻扎在原淮宝县曹王庄（今洪泽区朱坝街道曹庄村）。为探寻新四军抗大四分校的历史踪迹，我曾数次前往造访。

2019年6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我趁着早凉再次踏上前往曹庄村的乡间小路，寻访抗大四分校的知情者曹中杨老人。途中，突降小雨，不远处的曹庄村在绵绵细雨的笼罩下忽隐忽现，袅袅炊烟中，小村凭添了一份神秘与宁静。

进入村口，一排排整齐的房屋映入眼帘，青砖素瓦显得古朴典雅，一条条水泥道路宽敞平坦。我来到曹庄村7组，见到了曹中杨老人。82岁的曹老身体硬朗，耳聪目明，讲话口齿清楚，黝黑的面部皱纹纵横，写满沧桑。

我说明来意后，曹老便将储存在记忆深处的一件件往事娓娓道来……

1942年，抗大四分校刚到曹庄村时，人员分散居住在群众家里，后来还自己动手修建了相对固定的住所。驻地范围东西

宽约 80 米，南北长约 100 米，有房屋 30 间左右，为毛竹搭建的简易草房，还有部分帐篷。部队先在村民曹建民家屋后砌一口砖井，因水质比较咸而废弃。后来又在东边曹加华家屋后挖了一口土井，井口上担了两块条石，以方便取水。

部队医院先设在村民曹中学家里。电话总机房、电台安置在曹中杨四爹家，当时没有通电，依靠战士手摇发电。电话、电台在堂屋一张长条桌上呈一字排开。曹中生家屋后建有礼堂，室内能够容纳四五百人。东南、西北各留一处大门，室内西头设一处讲台，台下有数排简易的凳子，就是在地上打四根木桩，上面铺上木板，板凳由前到后依次增高。

曹庄村村部西边，坐北面南有一处戏台子，用黄土垫成，高 50 厘米左右，东西长约 8 米，南北宽约 3 米，可以供 10 多人同时登台演出。星期天的时候，部队经常开展演出活动，附近的群众也都来观看。

现在的曹庄村村部前面曾是部队训练的操场。每天天刚放亮，部队就出操了。训练刺杀、投弹、跨越障碍等。部队训练时，士兵们能从一人多高的墙上轻松地翻越过去。

战马训练时，骑兵用小竹篙子在马蹄上轻轻敲敲，口中“卧、卧、卧”地下命令，马就随着口令卧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每天早晚，骑兵都会在村庄周围溜马。部队晚上还开会、学习……

部队刚来时生活比较艰苦，吃的主要是高粱面、杂粮，后来条件逐渐好转，能吃到白面馒头了。

当年曹庄村只有 500 多口人，100 余户，2500 亩耕地。那

时军民关系非常融洽，群众积极为部队提供后勤保障。曹庄村曾有 44 盘大石磨，专门负责为二师五旅和抗大四分校所属部队加工粮食。推磨主要靠人工，少数人家中用毛驴。人工每天只能推 3 斗粮食（约 50 斤），驴每天能推 8 斗粮食（约 120 斤）。按照规定，每 100 斤玉米上缴符合要求的玉米面 85 斤，每 100 斤小麦上缴小麦面 65 至 70 斤，剩余的部分作为酬劳，归加工户所有。



散落在曹庄村的大石磨

部队穿的鞋子由村里组织妇女做，村干部每次根据各户成年妇女多少，分配给 5 至 10 双任务，叫“慰劳鞋”。每次完成“慰劳鞋”任务后，部队还会请老乡吃饭，表示感谢。

部队每次打了胜仗，地方群众总会组织起来敲锣打鼓庆贺，慰劳部队官兵，军民鱼水之情，令人难忘。

有位叫任（读音）团长的刚来时，住在 6 组曹长来家堂屋里。一次，在抗击日本鬼子的战斗中，任团长骑的枣红马被打

伤了无法行走。听说那匹马曾经救过任团长的命。由于伤情严重，虽经抢救也没有让那匹马起死回生。

1942年，新四军二师五旅旅长成钧在曹中杨家北头房里结婚。婚后，成钧夫妇住到6组曹廷才家，原来的婚房用于加工部队服装。成钧夫妇有了孩子，由曹中国的奶奶负责照看。

一次，曹中华与曹中杨闹着玩，不小心一脚踩到磨好的镰刀上，脚掌被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鲜血直流。曹中华父亲急忙将他抱到部队的医院治疗，脚治好了还没有收一分钱，让曹中华父子一直难以忘怀。

1944年10月的一个夜里，部队奉命悄悄撤离了曹庄村。

时间过去70多年，那段历史仍留在曹中杨老人脑海中。现在，曹庄村为改善农民住房条件，开始了集体搬迁工作，旧房屋将被拆除。为此，村里争时间、抢速度，开展革命文物寻找工作，陆续在村民房前屋后、杂草丛中、水码头、猪圈等处，寻找到12件大石磨、2件石碾子等物，希望今后还能发现更多革命文物。

抗大四分校在淮宝县造田种粮办工厂

为粉碎日伪扫荡、跳出包围圈，1942年11月15日，抗大四分校向洪泽湖东转移，在当时的淮宝县朱坝以南、盱眙县永丰镇一带，以学员队为单位，分散开展教学活动。

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乘日军扫荡之机，率部占领淮北抗日根据地山子头腹心地带。原担任淮宝防务的新四军二师五旅调往湖西参加战斗，抗大四分校奉命于1942年12月20日接管淮宝防务，学校移驻淮宝县曹王庄一带。

日、伪、顽狼狈为奸，对淮宝根据地严密封锁，给淮宝军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这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抗大四分校广大师生不等不靠，自己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

因地制宜造田种粮

淮宝地区属于平原地带，日、伪、顽相互勾结活动频繁，群众生活极其艰苦贫困，要完全保障上万人的后勤供应，困难

抗大四分校在淮宝县造田种粮办工厂

非常大。根据地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自给自足。

1943 年秋，抗大四分校全校总动员，在淮宝县蒋坝镇（今洪泽区蒋坝镇）洪泽湖大堤下的芦苇滩上筑圩造田、兴修水利、种植粮食。筑圩造田工程浩大，学校发动上千师生，从曹王庄驻地转移到洪泽湖大堤上安营扎寨。当时已是深秋，寒风凛凛，水冷如冰，但校领导身先士卒，带领师生下到齐腰深的水中，连续十几天，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挖排水沟，修筑圩堤，按计划顺利完成了第一期工程，造田 150 多亩。

当地群众积极支援抗大四分校造田种粮，赶来几百头猪，诱其掘食泥土中的芦苇根，同时深耕了土地。虽然当季下种晚了点，但是第二年便收获了粮食，有效保障了学校粮食供给。

粮食有了，吃油问题又凸显出来。

应运而生开办油坊

1943 年，学校在驻地曹王庄以南的赵集附近一个村庄，开了一座油坊。学校选派了四五名工作人员，又从当地聘请了几位群众，买了五六头骡子，购置 4 台榨油机，一座简易的油坊就办起来了。

油坊一开始由郝凤仪同志负责，后来又派了王世荣、张明两位同志一起去，组成一个领导小组。榨油所需的黄豆就近购买，每日可处理黄豆 1000 多斤，所产黄豆油除了供应学校各

连队外，多余的大部分交给合作社就近到仁和集（今洪泽区岔河镇）、应集（今金湖县应集镇）去销售，远一点的销到三河南铜城镇（今安徽省天长市铜城镇）。开油坊既满足了学校供应，又增加了经济收入，有时用黄豆油换大米回来，供应给各个单位。

在小油坊中，有一位随抗大华中派遣大队来到华中的八路军老战士王斗松。他个子高、力气大，非常能吃苦耐劳，后来成为很有名气的劳动模范。

解决了粮油问题，穿的问题又被摆上了议事日程。

因陋就简办被服厂

早在 1940 年秋，抗大四分校曾经在河南省建立过一家被服厂，后来向津浦路东转移时，被服厂就停产了。

1943 年，学校在油坊东边不到 10 里地的费庄筹建了一家被服厂。重建被服厂时仅有 20 多人，部分工人和缝纫机是从新四军四师师部被服厂调来的。后来，经过扩招，工人壮大到了近 60 人。被服厂除了生产军装、大衣外，还可生产少量布鞋、布袜。此外，还将几十位随军家属组织起来，做一些辅助工作。

被服厂从成立到结束，其内部行政工作一直由侯晋庭、刘敬朋两位同志负责，政治工作由张一民负责，张调走后由彭雪松接任。

抗大四分校在淮宝县造田种粮办工厂

1944年9月，抗大四分校转移到洪泽湖西半城后，被服厂也转移到洪泽湖西车路口，工厂工人已经发展到100多人。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淮安新四军工厂整编时，被服厂已经成为一家像模像样的军工厂了，可以按照季节生产，供应全校1000多人的冬夏军装，还有多余的军装供应给战斗部队。

因势而谋建兵工厂

1942年12月中旬，新四军四师在师长彭雪枫的指挥下，经浴血奋战取得了淮北反扫荡的胜利，蒋坝镇重新回到人民怀抱。抗大四分校接管淮宝防务后，新四军四师根据当时的有限条件，决定在淮宝筹办手榴弹厂，将厂址选在蒋坝镇的财神庙。

蒋坝镇街北头严增凯、严增亮两兄弟得知抗大四分校要办手榴弹厂时，毛遂自荐积极要求参军，为部队造手榴弹打日军。部队得知这对孪生兄弟有一手铸造手艺，如获至宝，欣然同意他们参军，到手榴弹厂当军工。

当时的手榴弹厂，其实只有一座炼铁炉，一具风箱。严氏兄弟从当地找来20多个年轻力壮的木工、瓦工、搬运工，手榴弹厂便应运而生。

他们没有造过手榴弹，部队同志就拆卸几枚手榴弹，让他们按照弹体照葫芦画瓢。兄弟俩果然名不虚传，对于手榴弹的制作工艺一看就懂，一学就会，轻轻松松将手榴弹的弹体铸造出来，交由分厂装填火药、安装引信，拿到洪泽湖边试投，一

举大功告成。

因为严氏兄弟在当地小有名气，实际能力突出，部队便将手榴弹厂交由他们具体操持。兄弟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分工明确。严增凯负责铸造，严增亮负责材料供应、对外联络、运送手榴弹到分厂组装成品，再送往部队。

缺乏钢铁，听说国民政府在造三河活动坝（今洪泽区三河闸）时，因抗战爆发，来不及运走的钢材就近沉入泗河（今蒋坝镇境内，距离三河闸约1公里）塘内。严增亮请来几位水性好的小伙子，下塘将钢材打捞上岸，运回工厂。另外，又组织人员收购大量生铁，满足了铸造弹体所需。

缺乏火药，严增亮带领兵工厂的同志，一面冒着生命危险，挖出敌人投下后没有爆炸的“哑弹”取出火药；一面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到敌占区秘密购买焦炭、硫磺、硝等制造火药的原料，有效地保障了手榴弹厂的正常生产。

兄弟俩以身作则，和工友们4人一班，实行三班倒工作制，大家忙得热火朝天。手榴弹厂每月开炉10多次，每炉铁水可铸造500只左右的弹壳。

制造手榴弹、采购原材料困难重重，组装好的手榴弹运送至部队时，同样是险象环生。

有一次，严增亮率领工友们护送一船手榴弹去洪泽湖西边的新四军四师，当船行至离湖西岸还有5公里水路时，突遇敌机低空盘旋轰炸，严增亮和工友们奋不顾身，迅速将船推入芦苇丛中隐蔽。最后，完好无损地将一船手榴弹送到新四军四师

供给部。

1943 年春，彭雪枫路过蒋坝时，专程到手榴弹厂看望严氏兄弟和工友们，称赞他们是不在前线的抗日战士。

抗大四分校被服厂寻踪

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丛书之《抗大四分校校史资料选编》中，由张一民、钱心展撰写的《抗大四分校的供给工作》一文中记载：“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军的封锁，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1942—1943年，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极为艰苦的时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渡过难关，抗日根据地军民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期间，新四军四师党委动员抗大四分校全体师生1000余人从淮宝县曹王庄（今洪泽区朱坝街道曹庄村）驻地转移到洪泽湖大堤上安营扎寨。师生们在芦苇滩上筑圩造田，在曹王庄南的赵集附近一个村庄开了一座油坊，在油坊东面不到十里的费庄建立了一处被服厂……

我曾经四处打听，八方寻觅，在洪泽区蒋坝镇洪泽湖大堤边寻找到筑圩造田的地点，在赵集老街找到了油坊的旧址。然而，离油坊不到十里的费庄被服厂旧址始终扑朔迷离，让人寝食难安。我想方设法联系到费庄村的相关人士，请求帮忙打听，

但一直杳无音讯。2021年8月，赵集村热心人俞启华突然联系我并告知，他已经寻访到了抗大四分校被服厂的知情人，让我欣喜万分。我特邀俞启华、洪泽区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夏宝国，径直踏上了被服厂的寻访之路。

时值处暑时节，车辆由北向南在宁连一级公路上行驶。窗外，一片片稻田碧绿如茵，让人赏心悦目；轻风拂面，飘来阵阵荷香，令人神清气爽。车行至赵集村时，左转进入一条水泥路，在俞启华的引导下行至费庄组，在洪金灌溉总渠立新闸西边不远处停下。俞启华在河堤北边一户人家，向我们引荐一位满头白发、身体微胖、看上去精神抖擞的老人。

经过一番交流，得知老人叫费百成，1941年生，其父费香莲，中共党员。当年，费香莲家里有60多亩地，每年收粮食5000多公斤，家里还磨粉、养猪，家境比较富裕。费香莲曾在新四军抗大四分校在费庄建立的被服厂担任供销科长。费百成虽然当时年纪比较小，但费香莲后来经常谈及费庄被服厂的往事，让费百成印象深刻。

费百成老人边说边领着我们，沿着他家西边的一条铺满碎砖瓦砾、杂草丛生的小道，向北走了约200米，用手指着右前方的一片玉米地说：“那玉米地原来就是一处老庄台，玉米地的西边是一片水稻田。”河西边正好有一位妇女在田埂上忙碌着，费百成说，那位中年妇女西边的水稻田就是他家的老宅。当时费香莲与兄弟费书华两家合一个大院子，两家有坐北面南的主屋各两间，东面南北向的三间侧屋是费香莲家的，西面南



费百成（左）介绍被服厂往事

北向的三间侧屋是费书华家的，主屋前面，两家还各有两间堂屋，如此便形成了一个“口”字形大院子。被服厂的厨房在费香莲家侧屋的前面两间，有两个人负责做饭。当时，被服厂的领导有姓侯（侯晋庭）、姓彭（彭雪松）、姓葛的等，都住在费香莲家里，还有一部分人住在村民费书洪家里。侯晋庭与费香莲结拜为干兄弟，认费百成为干儿子，每次吃饭时带着费百成一起去食堂。费书华家东边有一个小巷子，巷子东边是村民范端明家（即我们站立的位置），他家有土地 80 多亩，主屋三间，两边各两间房子，围成一个大院子，前面有一间屋，在西边的两间屋子里纺纱、做袜子。离费香莲家不远处的村民赵长宽家里，有人负责织布。还有生产服装、军帽、被子、打腿布的车间，都分布在其他村民的家里。

当时，被服厂分为两个小组，一个服装组有 30 多人、12 台缝纫机；一个制鞋组有 20 多人。工人中有新四军、干部家

属，也有一些地方群众。费庄村村民梁殿清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制鞋组组长，住在村民费香山家里。制鞋组的工作主要是打鞋帮子和上鞋底。鞋底先由制鞋组切好，然后交给地方群众纳底，每月可做军鞋 3000 多双。由于群众亲眼见过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暴行，抗日热情非常高，每天除了吃饭时间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每月补贴只有 3—5 元。待遇虽然低，但是大家个个都忘我地工作。厂里每月都会举行一次评比，大多数人都会受到表扬和鼓励，还会发一些诸如肥皂、毛巾、牙粉、牙刷之类的奖品。当时，村里杨登山和杨登顶兄弟俩都在被服厂，哥哥杨登山是裁剪师傅，弟弟杨登顶是学徒工，学习操作缝纫机。被服厂主要生产军装，也生产少量的便装。便装由厂里师傅裁剪好，交给群众手工缝制。在费香莲家西边的费后选家，有 5 间房子，电话、电台装在他家最前面一间房子里。

1944 年，被服厂随抗大四分校前往洪泽湖西时，费香莲考虑到家里的土地多走不了，后还是被厂干部做思想工作带走了。大概半年后，因家里的地多忙不过来，家里人又将费香莲找了回来。

费百成老人讲，1985 年，他家从老宅搬到现在的住处。他指着院子里的一盘石磨对我们说：“那就是当年磨粉的石磨，还有青砖、喂猪食槽、垫在木梁立柱下的石垫、家里现在用的门槛石，都是老屋上的物件；西边走道里还在使用的一扇旧门，就是当年新四军被服厂曾经用过的门。”这些斑驳陈旧的老物件历经沧桑，仿佛无声地讲述着曾经的岁月。

离开时，费百成老人对我们说，知晓当年抗大四分校被服厂情况的，还有一位 100 多岁的老人，名叫杨永贵，还健在。我们兴奋不已，于 2021 年 8 月底登门拜访了杨永贵老人。杨永贵老人住在洪泽区委党校小区，由儿子、儿媳妇照料其日常生活，头发花白，面部白皙，身材高大，语言交流顺畅，腿脚稍有不便。当我们说明来意后，老人沉思了片刻，便断断续续地向我们回忆了当年的一些往事……老人 1921 年 12 月生，1941 年 8 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村保长、盱宝区会计、淮宝县审计科负责人等职务。对于当年抗大四分校在费庄村办被服厂的相关事宜，他的陈述与费百成的回忆，除一些细枝末节稍有差异外，其他基本相符。

随着时光的流逝、历史的变迁，当年的抗大四分校被服厂，已经慢慢淡出历史，但这一抹红色记忆绝不能被忘记。在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抗大四分校坚持边战斗、边教学，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更激励着我们不懈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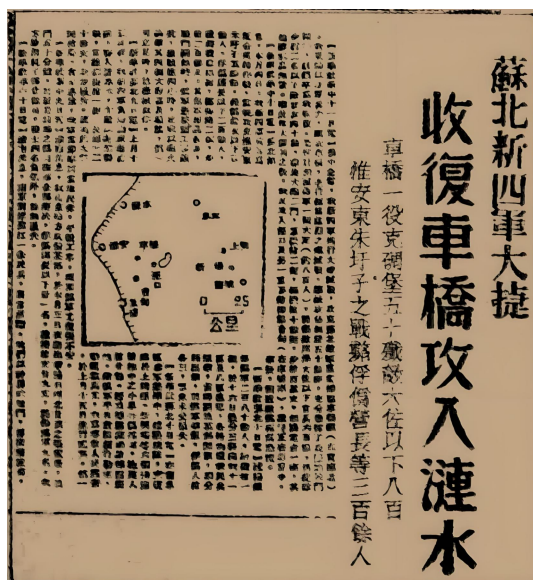
24 名日军战俘与抗大四分校

1944 年 5 月初，车桥战役中被俘的 24 名日军，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后，全部被安排进入驻扎在淮宝县曹王庄（今洪泽区朱坝街道曹庄村）的抗大四分校受训。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值得今人深入发掘。

车桥战役 惨败被俘

1944 年 3 月 5 日凌晨 1 时 50 分，在新四军三师及地方武装配合下，由新四军一师在淮安、宝应以东的车桥地区发动的车桥战役打响。

经过激烈战斗，歼灭日军山泽大佐以下 465 人，其中生俘日军炮兵中尉山本一山、军曹清水鲁吉、伍长梅村政一、宫本一郎及士兵共 24 人；歼灭伪军 483 人，其中生俘 168 人。这是新四军战略大反攻之前，敌后战场上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战役。



延安《解放日报》关于车桥战役的报道

日军被俘时，有人面孔烧焦了，有人眉毛烧完了，有人手上挂“花”，有人被打断了肠子，破烂的军衣上沾满泥浆、血迹、污渍等，完全是一副残兵败将狼狈不堪的模样。

新四军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为他们

换上新衣服，为他们精心治伤。可是，他们却呆在屋里静静地坐着，心事重重、沉默寡言，问话也不回答。苏中日本反战同盟的香河正男走进去与他们交流，他们不但不配合，反而骂他没有“日本的精神”，有的人还计划着三天之内逃回去。

新四军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离不弃，安排他们洗澡，邀请他们参加宴会，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日军被俘后的第四天，山本一山中尉向全体被俘日军表露：他不愿回去，希望留在新四军。然而，其他被俘日军并不都这么想。

一次，在徒步行军时，石川芳夫借故脱下皮鞋，赤脚行走。山本中尉不解地问为什么，他说：“皮鞋太重，走路不方便。”谁知后来，他却寻机逃跑了。被抓回来后，山本当即罚他立正，并教训他说：“你在这里还想跑，跑到哪里去？我们大家都没有面子了，你良心小小的！”

在教育改造期间，被俘的日军一度思想消沉，与新四军的对立情绪严重。吃饭时却一点也不客气，吃完饭把饭碗一推。内务好坏也不整理，只是一门心思想新四军为什么不杀他们，还优待他们？苏中日本反战同盟的人来看望他们，经过反复沟通交流、耐心教育后，他们才渐渐明白新四军不杀俘虏的道理。

新四军为了安抚日军的情绪，常常对他们说：“你们放心，不要怕！”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如春风细雨般滋润他们的心田，让他们也从心底里真正地理解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并活学活用。

一次，清水与长绳下围棋，一个胜了，一个败了，胜者对败者说：“你放心，不要怕！”问其缘由，回答说：“你败了不要紧，当了俘虏会受优待的。”

时间稍长，他们身上那种顽抗、敌对、仇恨与不满的情绪也就日渐消失了。

为此，淮北行政公署还特意举行了一次招待会，与被俘日军有说有笑地欢聚一堂。从此，日军逐渐放下戒备心理，活泼起来，与人谈话交流自然，并开始自觉参加劳动了。山本中尉主动帮厨，磨刀霍霍，切肉、切菜、炒鸡蛋，清水与宫本卷起

袖筒，提篮下河洗菜。

耳闻目睹 自惭形愧

经过一段时间的近距离接触，被俘日军逐渐对新四军有了全面正确的了解。

有一次，被俘日军碰到一支头戴清一色钢盔、着装整齐、步调一致、装备精良的队伍从身边走过。他们中有人好奇地问：“这是八路军吗？”当得到“那是新四军”的回答，他们愕然惊叹：“啊！新四军也有这样的部队啊！难怪我们的大队长吃败仗！”

他们看到在新四军队伍中，女同志背着背包行军打仗，与男同志相比毫不逊色。宫本说：“她们真有本领，我们比不过，惭愧！惭愧！”

又有一次，他们在路上见到新四军全连成建制的队伍，整齐地扛着三八式步枪，梅村感慨地说：“这些枪可都是我们兵工厂造的呀！”宫本也连忙接着说：“是的，不错。”当他们看见新四军还有电台、各种炮、重机枪时，更是摇头叹息道：“新四军有本领！”

一波三折 因势利导

为了更好地教育、整训 24 名日军战俘，新四军一师某团

特务营教导员、擅长左右开弓使双枪的荀毅抗奉命带领一个加强连，分乘几条小船，将他们押送到驻扎在宝应县北晏庄的新四军一师政治部敌工部。

一开始，被俘日军很惊恐，沉默不语，不肯吃东西。后来，经过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情绪逐渐好转并有说有笑，还情不自禁地唱起樱花歌。其中一名日军竟伸出大拇指说：“我佩服你们新四军作战灵活巧妙，士兵攻击精神旺盛，我们现在的战斗精神不如你们，日本皇军已经日暮途穷了。”

当船行至离北晏庄不远的一处乱坟堆准备登岸时，日军的情绪又发生波动，不敢上岸，生怕上了岸就被就地枪杀。经过敌工部派来的日本反战同盟的同志反复宣传解释，他们才陆续上岸抵达目的地。

一天晚上，日本反战同盟的同志与被俘日军按照日本式的坐席，举办了一场联欢会。席间，每人都轮流唱中国歌曲，跳日本式的舞。一时间，歌声、笑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室内外洋溢着欢快的气氛，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清水有声有色地模仿了一段电影片段，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酒后的大仓更是使出浑身的解数跳起舞来，不时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优待战俘 行之有效

本着优待俘虏的原则，新四军对被俘的日军，按照他们在日军中的薪水发给津贴。山本中尉每月领到 800 多元，其他战

士也按其等级发给 200 元、300 元不等。长绳非常感慨地说：

“新四军是官兵平等，没有阶级的，为什么还要按照我们原来的规定发给我们薪水呢？我们既然参加了新四军，都是一样生活、工作、战斗，为什么还要照我们过去的官兵级别来发津贴呢？”石川、水谷、寺尾等也同意要求官兵平等。他们认为，过去在日本军队中因为有等级，有理无处讲，现在到了新四军，有话就可说了。

几天后，原来日军中一些当官的也觉悟了。清水军曹说：

“是的，新四军是官兵平等，我们来到这里，都是一样生活与工作，要平等才好。”梅村和宫本也赞成清水的意见，并提出：“我们只要有香烟抽，薪水不薪水都没有问题。”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从那以后，被俘日军比以前更勤快了。他们自己洗衣服、补衣裳、缝干粮袋，自己的皮衣自己拿出去晒，自己拿着菜盆、饭桶到厨房里打菜打饭，早上起来也整理自己的内务。有一位日军俘虏脚负伤不能走，别人便替他推车子背东西。山本弄坏了老百姓一个茶壶，主动赔了 80 元。大仓在酒后买东西少给了钱，第二天亲自上门把钱付清，并且向老板道歉。

革命熔炉 名不虚传

1944 年 5 月初，车桥战役被俘的 24 名日军，全部被安排到驻扎在淮宝县曹王庄的抗大四分校受训。期间，由新四军四

24 名日军战俘与抗大四分校

师敌工部的日后藤勇（日籍）担任队长，政治教员由冈本匠（日籍）、香河正勇（日籍）担任，党政工作由校部机关党支部书记向明同志负责。

日训队主要是启发被俘日军的阶级觉悟，认清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本质。经过教育，24 名日军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从忠于天皇到认识到天皇是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认识到他们参加侵华战争是有罪的，对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充满感激之情。

经过近 5 个月的学习，结业时很多人痛哭流涕，都说一定要同中国人民友好，坚决反对战争。在学习期间，经过组织考察，还发展了几名党员。

车桥战役中被俘的山本中尉等 24 名日军，后来在反战同盟战线上，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从战俘到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还被安排到抗大四分校学习，这不仅是身份的改变，更是由表及里的灵魂洗礼，是一次人生的蜕变，更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伟大胜利！

追忆彭雪枫师长

2024年6月，在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同志英勇牺牲80周年之际，我们应约前往北京采访新四军四师拂晓剧团老战士黄石文，共同追忆彭师长与拂晓剧团的点点滴滴。97岁的黄石文老人中等身材、面色红润、精神矍铄、平易近人，言谈举止之中，彰显出军人的不凡气质。



采访黄石文（右）老人时的情景

黄石文，男，1927年11月8日生于北京，祖籍湖南长沙。

其祖父博学多才，满腹经纶，尤其精通中医，是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麾下的一名幕宾，曾应邀为左宗棠的部队配制去暑避寒的药物。张之洞后来到北京担任内阁大学士，带走一批随从人员，其中就有黄石文的祖父。因此，他们举家迁到了北京。

1938年，黄石文小学五年级时，加入了由中共地下党河南省委组织的开封“孩子剧团”。1940年3月，13岁的他于安徽省涡阳县参军，成为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创办的“拂晓剧团”的主要演员。

重视文艺 创办剧团

在黄石文的记忆中，彭雪枫非常重视文艺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担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期间，创建了骑兵团、拂晓报社和拂晓剧团，这被四师的官兵们称为彭雪枫师长的“三件宝”。让黄石文至今仍然念念不忘的是彭师长在1938年5月创建的拂晓剧团。为办好拂晓剧团，彭师长提出：“要编一些配合当前抗日斗争的小话剧和活报剧，向群众宣传抗日必胜的道理，同时揭露汉奸和伪军罪行，打击日寇气焰。这样，既活跃了部队文化生活，也教育了广大群众。”

拂晓剧团当时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工团，有30多人，京戏、话剧、舞蹈、相声、歌咏等都可以演，经常演出的节目有延安那边传过来的秧歌，四师师部驻地洪泽湖区一带流行的舞蹈剧

花挑子等。剧团每到一处地方，创作人员便下部队、访民间，开展采风活动，将抗战中的英勇人物、群众中的拥军典型、支前模范等先进事迹，编入到文艺节目里表演，对宣传抗战、动员参军、开展支前工作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反响强烈。演出节目中，还有将京戏里的《花子拾金》改编成现代戏《花子拾炸弹》。还有一些喜剧性的小节目也很吸引人，如写伪军起义的大型剧目三幕剧《反正》就深受欢迎。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拂晓剧团以文艺为武器，宣传抗日救亡，鼓舞士气，凝聚人心，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彭师长曾经这样评价拂晓剧团：会唱歌、会写文章，是一支政治突击队。黄石文老人回忆道：“正如彭师长所说的那样，在当时的战斗生活中，群众收麦子时我们去帮助，部队打仗的时候我们下连队同战士一起上第一线，抓了俘虏我们去做思想工作，有起义的部队我们去做宣传员。我们不是一支简单的搞文化宣传的剧团，而是一支预备队，是文艺宣传队、政治突击队、抗战的尖兵！”

邀请名师 传经送宝

新四军四师从津浦路西转移到路东以后，彭师长为了培养部队的文艺干部，提高本地区文化工作的水平，可谓是煞费苦心。为此，他想方设法，办了一期文艺培训班。

1942年3月，彭师长到盐城新四军军部开会，恰巧遇到贺

绿汀等一批文化人，经过华中地区准备到延安去，需要部队护送他们过铁路、过封锁线。彭师长曾经在山西做阎锡山工作的时候认识贺绿汀，他们比较熟悉。为此，彭师长在征得贺绿汀一行同意和上级批准后，让他们从盐城到半城小朱庄，给拂晓剧团进行了半个月的专业培训。

彭师长请来的一批老师中，除了中国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游击队之歌》词曲作者贺绿汀外，还有经济学家钱俊瑞、油画家莫朴、翻译家梅益、新四军四师淮北区党委宣传部长冯定等。彭师长将“拂晓剧团”、新四军四师九旅的“奋斗剧团”、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大众剧团”、抗大四分校的“生活剧团”、各分区的文工队共 1000 多人组织起来，举办一期文艺训练班。贺绿汀说，音乐讲究的一个是节奏、一个是旋律。他以《游击队之歌》为例，一边唱着，一边打着节拍进行演示，讲清什么是音乐的节奏、旋律。如果将有节奏、旋律的乐谱填上歌词，就成了歌曲。他还讲解什么是和声，并且拿出刚写的五部混声大合唱《1940—1942 年大合唱——救中国》进行教学。其中，有女高音、男高音、男低音等。他说这首歌还没有发表，先教你们唱，虽然很难唱，但是你们要坚持就能学会，就会将整个歌唱水平提高一大步。钱俊瑞讲新闻的五大要素，什么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果。莫朴讲绘画，他说绘画讲究距离、透视，它由线条、明暗等要素组成。梅益讲翻译和创作。冯定讲唯物辩证法。这些大师级的老师善于因人施教，用朴素的语言，将深奥的理论讲得浅显易懂，便于掌

握运用。解放后，他们都到北京当了教授。

这次培训，对于只有高小、初中及少部分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学员来说，真是受益匪浅，帮助非常大。黄石文通过刻苦学习，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显著提高，他下部队采访写一些诗歌，给战斗英雄刻肖像、画画等，然后在《拂晓报》副刊上发表。他既能表演又能写写画画搞创作，后来担任了组长。

爱兵如子 体贴入微

彭师长对拂晓剧团团员们在生活上极其关心，可谓无微不至。

有一段时期，因工作忙、任务重，卫生方面有所疏忽，导致拂晓剧团工作人员的身上长疥疮、生虱子，衣服缝里随处可见白花花的虱子卵。彭师长知道了非常生气！他对拂晓剧团的团长严肃地批评道：“你这团长是怎么当的？赶快去弄一批柴火烧开水，将所有人的衣服都烫一遍。”他要求大家都将衣服脱了下水洗澡，特意安排人在河流的上游用芦席遮挡起来，让女同志们也能痛痛快快地洗一把。同时，要求加强驻地环境卫生整治，个人养成卫生习惯，积极开展科学防治。

彭师长经常给《拂晓报》写社论、评论文章，所得稿费毫不吝啬，常与拂晓剧团工作人员分享。

1942年中秋节的晚上，拂晓剧团工作人员正准备睡觉，彭师长的警卫员突然跑来说：“师长叫你们赶快过去，拂晓报社

那边也有人去叫了。”当拂晓剧团和拂晓报社工作人员来到大柳巷时，彭师长将一盏汽灯点亮，挂在淮河边一条船的桅杆上。然后，招呼大家在群众的打谷场上席地而坐围在一起。他用自己的稿费买来了两担大西瓜，分给大家吃。然后，大家一边吃西瓜，一边听他讲过去长征时期的故事。期间，还演出一些小节目、说笑话、猜谜语等，非常诗情画意、愉快幸福，令人终生难忘！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彭师长用这种方式与拂晓剧团、拂晓报社的战士们共度中秋，让他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视书如金 乐于分享

彭师长特别喜欢读书，非常爱写文章，他是《拂晓报》社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经常用所得稿费帮助那些生了病、负了伤、生活困难的同志，也会用稿费来买书等，其藏书非常多。

新四军四师在津浦路东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便利条件，联络部长任泊生、敌工部长王子光等，经常到上海去联系地下党开展工作，采购药材和兵工厂缺乏的材料等。彭师长总会请他们带一些新书回来，购书所需要的钱用他的稿费支付。彭师长不仅自己爱看书，还倡导身边的同志多看书学习。他的书对拂晓剧团、直属队的同志开放借阅。他有两枚图章，一枚是“书有未曾经我读”，是由拂晓报社的庄方为他刻的。刚买回的新书，由秘书负责盖上这枚图章，暂时不对外借。彭师长对于刚

买的书，有的地方细看，有的地方只是浏览一下，他看过了的书由秘书盖上另一枚图章“有书大家看”，只需直接找他秘书就可以借。

有一套书名叫《静静的顿河》，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写的，有4册，彭师长看完了拂晓剧团的人就去借。为了看得快一点，二三十个人按顺序排队，每个人看1册的时间限定3个小时，时间一到不管你阅读到哪里自己记住，然后依次传给下一个人阅读，3个小时后再传给下一个人，以此类推，这样让书流动着给大家看。彭师长知道大家这么喜欢读书，非常高兴！

批评教育 一针见血

一次，彭师长到拂晓剧团看演出，恰逢台上两个姓张的演员正在说相声。在演出过程中，其中有一位在相声中模仿警卫团团团长陈胡子（留有一大把胡子）的语言：“眼咋看、眼咋看，一络毛糙胡！”原来，有的人看陈团长留着的大胡子觉得奇怪会多看一眼，陈团长总会非常生气地说：“眼咋看、眼咋看，一络毛糙胡！”彭师长在台下看到这个演出，立即喊：“停、停、停！这个节目不演了。”他非常严肃地批评说：“你们以这样的态度搞创作是不对的。”

还有一次，拂晓剧团有人编了一出活报剧，讲一个落后战士是如何转变的。剧中将那个落后战士丑化了。彭师长看后说：“这个节目不行，应当去掉。我们对于落后战士，包括他们的

缺点，应当采取爱护和帮助的态度，不能讽刺讥笑！”

在采访过程中，黄石文老人时而面带微笑、时而神情凝重，谈到动情之处几度哽咽流泪，言语之中充满对彭雪枫师长的深深思念之情！他满怀深情地说：“彭师长是我的恩师，他的教诲让我受益终身。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拂晓剧团老战士成长中的故事

一个孩子剧团 道来秘密多

1938年，11岁的黄石文读小学五年级时，加入了由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危拱之在开封成立的孩子剧团。危拱之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一书中所记载的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女红军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联合抗战，河南省主席、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与共产党领导人的关系颇为融洽。他向周恩来请求，派一批共产党干部到战区负责战地工作，如动员群众、帮助部队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等。这样，就有许多共产党人应程潜之邀到第一战区开展工作，危拱之就在这一时期担任了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并亲手组建了开封“孩子剧团”。

“孩子剧团”驻扎在一个地主家的大院子里对着正门的二层楼上，属于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政治部的驻地。其行政管理名义上归河南省教育厅，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组织。

地下党的同志开会、接头、分发文件、路过等，都以剧团里孩子们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等亲戚名义，在“孩子剧团”进行。因地处国民党机关，所以一般不会引起外界的怀疑。多年后，黄石文看到电影《红灯记》里面唱词有“我家的表叔数也数不清”时坦言：“我们当时的表叔也是数不清的！”

当时，地下党的同志一到“孩子剧团”，就有人安排黄石文等孩子们出去放哨。如果见到有陌生人来，孩子们就唱《红缨枪》这首歌为暗号：“红缨枪，枪缨红似火，枪头放银光，拿起了红缨枪，去打那小东洋……”楼上正在开会的同志，听到孩子们发出的暗语，立即将文件收起来藏在麦秸堆或者高粱杆堆子里，把麻将放在桌子上，以打麻将为掩护。有些特务以关心“孩子剧团”为名，经常去“串门”，当问及刚来的一些生人时，剧团里人就会以这是谁的什么亲戚来作掩护。

“孩子剧团”是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摇篮”，在那里，孩子们学文化、学演出、学做人，树立崇高理想，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一支骑兵团 创建费心机

1940年，13岁的黄石文成长为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创办的“拂晓剧团”的主要演员。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在黄石文心中，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彭雪枫师长创建的骑兵团。骑兵团最早的雏

形，是彭师长的警卫排，从河南确山竹沟出发的时候有二三十匹马。因为红军在西征时吃过军阀马鸿逵、马步芳的亏，所以，彭师长从红军时候，心里一直想着怎样建立一支自己的骑兵。



新四军四师骑兵团部分干部在泗阳界集（今属泗洪县）合影

说来也巧，延安和八路军总部给豫皖苏根据地派来的一批干部中，正好有一位是懂骑兵的，彭师长就让他当了骑兵连长。马匹不够，彭师长将自己的马和司令部、政治部的马都捐出去，各个分区可用的马都集中起来，组成一个连。有了骑兵连，彭师长还想建立一个骑兵团。得到的回答是：要建一个骑兵团不容易，因为骑兵很费钱；还有，要先培养一批骨干，先将骑兵连的战士培养好，将来用这批人作为骑兵团的骨干。

到了津浦路东以后，相对比较稳定下来了，彭师长就筹划如何将骑兵团建起来。拉车、耕地的马不能用，它们已经不可训练了，需要买一批年轻一点的小马培养，缴获敌人的马也可以。那时，驻地离盐阜比较近，彭师长就派骑兵连拉盐到缺盐

的地方去卖，赚了钱用于买马。骑兵团成立的时候，有了一批骨干，也有了一批马，周纯麟同志任骑兵团的团长。当时，骑兵团用的刀叫“雪枫刀”，其特点是比西北马家军的刀长一寸，这样打起仗来比较厉害，一寸长，一寸强嘛！打刀的材料需用绝对的好钢打，于是，就设法破坏敌人的铁道，以及将兵工厂里收到的好钢，都用于打骑兵的刀。所以，我们的骑兵后来与敌人作战时，一点都不吃亏！因为，我们的骑兵训练有素、刀又长，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高，打起仗来非常勇敢不怕死，所向披靡。

一首打油诗 妙语化困境

1943年8月1日，正值抗大四分校第四期三队、四队毕业，第五期三队、四队开学之际，新四军四师师长兼抗大四分校校长彭雪枫亲临淮宝县曹王庄抗大四分校校部举行毕业、开学典礼，为两期同学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与彭师长随行的还有拂晓剧团。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上午的庆祝活动顺利举行，下午，抗大四分校副校长吴芝圃为学员讲解了唯物辩证法。抗大四分校1000多名学员背着背包，集中在群众的打谷场上，以背包为凳、以膝盖为桌，听吴副校长上课，拂晓剧团的演员也被安排一同参加听课。

吴副校长专业的理论功底、朴实的语言风格，结合日常生

活中的一些典型事例，将高深的唯物辩证法理论，讲得浅显易懂，让学员们好理解、易掌握、便运用。

理论讲解告一段落后，进入提问交流环节，黄石文和其他几位拂晓剧团的演员便离开课堂去装台，为晚上的文艺演出做准备工作。后来，黄石文听随行的拂晓剧团其他人员讲：“你们离开课堂后，发生了一件稀奇事。”

在进入提问交流环节时，针对同学们提出的一些唯物辩证法疑问，吴副校长都一一给予了答疑解惑，让学员们受益匪浅。后来，不知是谁递上去一张纸条，内容是：“经常有人争论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对于这个问题，请吴副校长给我们解答一下。”这道题明显属于进化论，而不属于唯物辩证法范畴问题。当念完纸条上的内容时，下面的学员议论纷纷：有人说这不是捣乱吗！如果吴副校长一生气再发一通脾气，这堂课不就乱套了吗！有人说，如果吴副校长追查是谁写的纸条子，再狠狠地批评一下那个学员，那好好的一堂课不是被搅黄了？如果吴副校长站在讲台上无言以对，那不是非常难为情吗？

当时，正在台下听课的政治部主任邱一涵和学员们都非常着急，人人都将心提到了嗓子眼，一双双眼睛都将目光聚焦在吴副校长的身上。然而，站在讲台上的吴副校长对于这个提问，先是莞尔一笑，然后，略加思索了一会儿，便不紧不慢地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常见鸡生蛋，又见蛋生鸡。欲问谁在先，古来有争议。此为进化论，容后再研习。”吴副校长一首打油诗，巧妙地化解了困境，既不伤和气又不失儒雅风范，让大家

心服口服。在 1000 多人的大课堂上，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能够沉着冷静巧妙应对，说明我们的领导同志都是非常智慧的。

事后，邱一涵在与黄石文等演员谈及此事时，对吴芝圃的博学多才与遇事不惊的应变能力赞不绝口！

超凡脱俗的母爱

八十多年来，在洪泽湖东岸，一直传颂着一则感人至深的暖心故事：抗战时期，时任淮宝县王集乡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的朱文英，为了坚守承诺，不辜负组织信任，在长子夭折情况下，宁可将自己新生幼子送到妹妹家寄养，也要坚持抚养抗大四分校教员的孩子，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孩子被其父母派人接走。

情之所系，心之向往。我带着几分敬佩、几分疑惑，特登门采访了家住洪泽区朱坝街道的朱文英之子朱克美，听他讲述了那段动人的故事。

组织信任 义不容辞

朱文英，女，1915年10月生，抗战时任淮宝县王集乡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1992年9月病故。

1942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简

称“抗大四分校”）移驻淮宝县曹王庄（今洪泽区朱坝街道曹庄村）。当时，正值“淮北33天反扫荡”期间，敌人来势汹汹、敌情变化莫测，对敌斗争任务异常复杂艰巨。抗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张明河、文化教员沈琦夫妇，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恳请地方政府将他们生于1942年9月3日、才100多天的儿子张正洪寄养在当地农户家。



老年时的朱文英

时任淮宝县王集乡乡长的王玉堦接到任务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张正洪嗷嗷待哺，没有奶水的妇女收养不了。可是，在那困难时期，哺乳期的妇女一个人喂养一个孩子可能奶水还不够，喂养两个孩子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经过再三思考，王玉堦最终决定将这艰难而又光荣的任务，交给性格活泼开朗、为人正直厚道、责任心强、正处于哺乳期的朱文英。朱文英二话不说，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朱文英早早地起床，像去迎接亲人一样，按照约定的时间前往抗大四分校。在校首长和地方领导的见证下，沈琦两眼噙着泪花，在儿子的小脸、手上亲了又亲，带着满心的眷恋和无限的不舍，将包裹得好好的张正洪缓缓地交到朱文英手中。朱文英双手接过孩子，安慰沈琦道：“孩子寄养在我家，

请你放宽心，我一定会像亲生的一样对待他！”

就这样，朱文英以坚定的组织观念和高度责任心，接下了这充满人性光辉的使命。多少年后，朱克美曾不解地问母亲：难道不能借故推脱吗？“你父亲为了革命工作经常在外很少回来，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能不难吗？但再难也不能辜负组织上的信任！”朱文英解释说。

一诺千金 永不言弃

当时，朱文英家的儿子比张正洪大，又是头胎，很受父母宠爱，出生后便为他取了乳名“太子”。对于新来的养子，朱文英特意请当地一位有文化的人给他取一个大气的乳名：洪中，至于其中的寓意已不得而知。

随着“洪中”的到来，朱文英一边忙于工作，一边照顾两个孩子，从早忙到晚，夜里睡不了一个安稳觉。人们经常看到她一手搂着一个孩子一左一右喂奶时，竟身不由己地打瞌睡。为让两个孩子少挨饿，她经常带着孩子到处于哺乳期的妇女门上讨奶喝。有时因为缺奶，朱文英将奶头从自己儿子的小嘴里强行摘下来塞进“洪中”的嘴里，急得“太子”手舞足蹈嗷嗷叫，她无奈只能默默地陪着孩子流眼泪。久而久之，“太子”因缺少奶水喂养渐渐消瘦、抵抗力下降，稍微经受一些风寒便会感冒，有时还传染给“洪中”。于是，朱文英经常后面背着一个孩子、前面抱着一个孩子求医问药。

张明河、沈琦夫妇平时工作忙，有时遇到敌情还要转移，后来随着学校重组离开淮北，更是无暇看望孩子。组织上有时给予朱文英一些力所能及的照顾，同村的群众也会设法接济一些，有正处于哺乳期的妇女会自发地省下一些奶水帮她喂孩子，也有人背地里劝她实在不行就不要硬撑下去，将新四军的孩子送回去。朱文英心里理解，可她觉得 1000 多人的抗大四分校有四五个孩子寄养在群众家里，作为一名妇女干部，她要为其他收养孩子的家庭做好榜样！她认为，自己既然接受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就是再难也要完成！就这样，朱文英一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咬牙坚持。

随着时光的流逝，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他们学会了走路、学会了说话，都亲热地叫朱文英“妈妈”。两个孩子每天陪伴左右，有时候还淘气地撒娇争宠，争抢着喊“妈妈”，一个比一个声音大。每当看到两个孩子可爱的样子，听到他们稚嫩的叫声，朱文英深深地感受到了双子绕膝的天伦之乐，心里别提有多开心，觉得之前所吃的苦所受的累都是值得的！

“大子”从小乖巧懂事，“洪中”生性活泼、讲话口齿伶俐、非常讨人喜欢，邻居们有空也会来陪他们玩，逗他们开心，有时还会给他们送来一些好吃的。朱文英有好吃的、做新衣服也总是首先想着“洪中”。

1945 年 8 月 15 日，人们敲锣打鼓、欢庆抗战胜利。大家本以为从此以后，可以踏踏实实地过上舒心的好日子。谁知，蒋介石却屡屡挑起事端、制造摩擦，发动了内战，中华大地再

一次被阴影笼罩。

身处险境 临危不乱

1946年6月，内战爆发后，朱文英积极组织广大妇女为前线部队筹粮、筹草、做鞋、照顾伤员。

10月4日夜，淮宝县及区乡武装接到通知，400多人北撤。国民党军队、地主还乡团进入淮宝县，进行疯狂残杀，顿时，血雨腥风、白色恐怖笼罩淮宝大地。朱文英带着两个孩子，处境非常危险。

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艰难时期，“太子”又生病了，接着“洪中”也病了，两个孩子流涕、呕吐、发烧，让朱文英劳心又费神。

一天，朱文英带着两个孩子到一家诊所医治。突然，有个人气喘吁吁地跑来报信：“住高良涧的还乡团要来抓‘洪中’向国民党邀功，你立即带着孩子赶往王集乡‘老地方’。”朱文英闻讯将“太子”托付给一位邻居，带着“洪中”走小路、抄近道，直奔王集乡。懂事的“洪中”正在发烧，满脸绯红，心里难受又不敢哭闹，口中反复念叨着：“妈妈我怕！妈妈我怕！”两只小手紧紧地抓住朱文英的衣服。朱文英一边拼命往前赶路，一边安慰孩子：“有妈妈在，你别怕！”当她越过几片高粱地，过了两条河，拐过几道弯，跑到一处岔路口时，慌乱中把一只鞋子跑掉了。朱文英本能地停下脚步正准备捡鞋

子，隐隐听到身后有人大声叫喊：“站住！站住！”她急中生智，顺势一脚将鞋子踢到另一条岔路上，抱着“洪中”来到高粱地里一处坟地隐蔽起来。过了一会儿，后面追上来的人赶到岔路口，看到路上有一只跑丢的鞋子，便头也不回地沿着那岔路追去。

等他们渐渐走远了，朱文英唯恐那帮人追了一段路不见人又折回来，便不再沿着小路走，而是在高粱地里沿着田间的小墒沟凭着记忆向王集乡赶去。

一路上，朱文英一会儿抱着孩子走，一回儿驮着孩子跑，慌乱中不知摔了多少跟头，膝盖被跌破了，脸上、手上、胳膊上，多处被高粱叶、杂草、藤蔓划破流血，她又急又累，身体濒临虚脱，却没有让“洪中”受一点伤害。

好不容易到了王集乡的村口已近傍晚。为安全起见，她不敢贸然前往，而是停下脚步隐蔽好仔细观察。过了许久，她见村内没有异常，便准备前往那称为“老地方”的一户人家。当她在高粱地里探出头时，发现不远处一个人正向她这边匆匆跑来，她立即折回高粱地静观，等那人走近时定神仔细一看，正是白天给她报信的那个人。原来，报信的人一连向几个村子的人传递了信息，返回驻地后，等了许久仍未见到朱文英母子前来，便四处寻找。朱文英立即主动迎了上去。那人本能地将“洪中”抱在怀里，来到了指定的地点。进入屋内，在昏暗的油灯下，朱文英才发现自己那只没有穿鞋的脚两个脚趾头被踢破，脚底被异物划了一道道血口子。

还乡团的人经常进村搜查。为了躲避搜查，朱文英和“洪中”被安排躲在地窖里。“洪中”只能吃一些简单的药，发烧了用湿毛巾敷一敷。朱文英始终陪伴、照料着“洪中”。

几天后，组织上潜伏下来的人员花钱托人打发了还乡团的头子，朱文英母子这才相安无事，得以回家。

母爱如水 情深似海

朱文英回到家，方知“太子”因为病情严重而夭折了。原来，朱文英走后，又气又恼的还乡团扬言，只要抓不到新四军的孩子，就抓她家的儿子充数，以至于“太子”病重了也不敢到医院就医。朱文英一边强忍失子之痛，一边立即给“洪中”治病，经过好几天的医治，用了许多的药，最终，孩子的命是保住了，但落下了左耳听力严重受损的后遗症。对此，朱文英懊悔不已，陷入深深的自责中。她想到“太子”，心里异常难过，觉得对不起年幼“太子”，没有能让“太子”幼小的生命健康成长，甚至到死连一个大名都没有留下；她又感到对不起“洪中”，认为自己辜负了“洪中”父母的托付。她越想越自责，在失子之痛和“洪中”落下耳疾的双重打击下，情感的堤坝终于被击溃。她哭得天昏地暗，像一个泪人似的。闻讯赶来的邻居、亲友们，一边陪她流泪，一边好言相劝，有的说“太子”走了不能复生；有的说“洪中”虽然耳朵落下残疾，但能保住命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你已经尽力了；有的说事已至此

你要想开点……

“洪中”一天天长大，朱文英将满腔的爱都倾注在他的身上，宁可自己挨饿也要让“洪中”吃饱，宁可自己受冻也要让“洪中”穿暖。她还教“洪中”学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教育他学本领、学做人……

1947年1月，朱文英的第二个儿子呱呱坠地，给这个家庭增添了一份喜悦。看着如同是失而复得的小儿子，朱文英的心里别提有多美！为此，朱文英特意给他取名朱克美。小“洪中”的心里也乐开了花，忙着跑前跑后像个“小大人”似的，帮着照看弟弟，帮助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有的邻居们私下议论，朱文英应该好好抚养刚出生的第二个孩子，以弥补痛失“太子”的遗憾。谁知，朱文英为了全身心地照顾“洪中”，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危机，在朱克美满月后不久，便做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将小克美托付给自己的妹妹抚养。采访中，朱克美谈及此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情不自禁地感叹道：“我妈妈对‘洪中’的心，比对我还重啊！”

1950年秋的一天，组织上派人找朱文英谈话，告知她“洪中”的父亲派警卫员来接孩子回家，问她有什么要求？朱文英非常坚决地说：“当初答应收养孩子，并不是图什么，我没有要求！”“洪中”从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长成一个8岁的大男孩，朱文英付出的牺牲与辛劳，组织上十分了解，邻居们也都看在眼里。

朱文英回到家里，给“洪中”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将他身

上的衣服换下来清洗晒干，并将破损的地方缝补好，将母子即将分离的那份不舍埋藏在心里，一个人在背后默默抹泪。

“团圆的饺子，离别的面。”第二天，朱文英特意为“洪中”下了一碗面条，里面还放了两个荷包蛋。毫不知情的“洪中”吃过早饭，如同平常一样出门与邻近家的孩子在一起玩耍。

根据当天与“洪中”一起玩耍的邻居家小孩、84岁的陈玉华回忆：“‘洪中’那天正和我在一起玩时，他家来了几个陌生人，他妈便将他喊了回去，我也跟了过去。看见他妈先端来一盆水，用毛巾给他的手、脸洗了又洗、擦了又擦，然后，用一把木梳子将他头发梳了梳，帮他衣服理了理，然后她心平气和地告诉‘洪中’：‘你的亲生父母派人来接你走了。’‘洪中’听后，‘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哭着闹着不愿走。后来，他妈哄他说，去北京父母那里能治好耳朵，他还是不愿走，哭喊着说：‘你就是我的妈妈，我哪里也不去！’无奈，前来接‘洪中’的人只好将他绑在独轮车上带走了。”

朱文英望着“洪中”越走越远的身影，听着“洪中”撕心裂肺、越来越小的哭声，再也无法控制心中的感情，失声痛哭起来，在场的乡亲们也纷纷跟着抹泪。“洪中”走后，她一直将对“洪中”的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

2024年6月4日，我专程到张正洪曾经工作的单位，本想当面采访他，遗憾的是，他已经于2011年1月病故。据张正洪的妻子郎如征回忆，“洪中”回到北京后，因左耳朵听力障碍，在学习、工作、与人交流方面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他认真

努力，工作负责，还入了党、提了干。他心里一直非常思念养母朱文英和曾经给予他许多帮助的乡亲们。

1992年9月中旬的一天，经历了多少年思念煎熬的张正洪终于下定决心，回到时为淮阴市洪泽县朱坝乡的朱坝村，看望日思夜想的养母。可是，当他来到养母家时，却非常痛苦地得知：养母朱文英已于一周前离世。张正洪多年来的离别之苦，一下子化作了无言的泪水。他在养母的坟前一边烧纸，一边哽咽流涕，懊悔自己没有早点来，没给养母尽一点孝心……

一周后，张正洪带着懊悔、遗憾，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个他曾经生活了8年的家。

常言道：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张明河、沈琦夫妇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毅然决然地将襁褓中的婴儿寄养在群众家里。那小小的婴孩，是他们心中无尽的牵挂，可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忍痛割爱，舍小家为大家，让人感佩！而朱文英，这位朴实无华的农村妇女，悉心抚养新四军的孩子，在承受失去长子的巨大悲痛后，依旧坚定地将出生不久的二儿子寄养在妹妹家，用那宽厚仁慈的母爱，无声地诠释着“军民鱼水情”的深刻内涵。她的感人事迹与崇高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敬仰和铭记。

抗大四分校陶林间谍案

2024年6月7日，我们应约前往辽宁省本溪市，采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淮宝普通科女学员张俊。96岁高龄的张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一口地道的淮安乡音，让我们从心里油然而生一种特别的亲近感。

张俊，女，曾用名张德俊，1928年2月生，江苏省淮安县驸马巷人。因其母生病早逝，自幼随祖父、祖母生活。“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年幼的她读完私塾又读小学至毕业，同时还要操持家务，吃苦耐劳，独立性很强。

1939年，日军侵占淮安县城前，张俊与祖母和叔叔们举家迁至祖母的娘家淮宝县岔河镇避难，无奈辍学在家，



年轻时的张俊

然其求学之心从未泯灭。

岔河镇是一片红色热土，张俊亲属中有多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或政府工作，对其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崇高理想，在她的心里潜滋暗长。

1940年2月，张俊瞒着家人，与8名同乡一起去韦集小街投奔新四军，从此，正式踏上革命的征程。

1940年4月，张俊在淮南大众剧团8分团任团员、在淮南艺术专科学校（新四军二师）任学员，后进入淮宝干训班学习。194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月在淮宝办事处胡桥区任妇救会主任，6月在淮宝办事处任文化教员、会计。

1942年1月，为加快培养地方干部，由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担任校长的抗大四分校，在根据地内创办淮宝普通科并广布招生广告，大量吸收具有高小和初中以上文化的学生。当时张俊年仅14岁，按照《抗大四分校普通科招生简章》规定，未达17岁的最低入校年龄。在张俊一再请求下，经淮宝县政府协调，学校鉴于她情况特殊，又是本地人，且具有文艺特长等优势，特批其进入抗大四分校第四期普通科学习。

1942年2月底，首批录取学员200余人到校正式开学。学员中，多为青抗会人员、农会会员、妇抗会会员、武装基干民兵队长，亦有来自各个阶层和敌占区的知识青年。这些学员年纪轻，爱国心强，抗日情绪高昂。抗大四分校普通科开始设在淮宝县岔河西南乡的孙夏庄，不久迁至该县的袁家三门、四门和高良涧，后又驻扎于淮宝县曹王庄校园。

访谈间，张老还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动人的歌声、优美的旋律、激情澎湃。张老一边唱，一边情不自禁地轻轻打着节拍，举手投足间仿佛又回到那烽火硝烟的抗战岁月。

在张老的记忆中，淮宝县曹王庄东西长约十里，素有“十里曹王”之称。抗大四分校移驻于此，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千方百计想派遣日本特务打入抗大四分校刺探情报、搞策反、伺机破坏等。经过深思熟虑，日特机关以美女为饵，派一位20多岁、容貌甚美的女特务，化名“陶林”，从淮安城内来到曹王庄的抗大四分校。她巧言令色，谎称自己是学生，不堪忍受日本鬼子压迫，特到解放区欲参加新四军。当时负责招收学员工作的张健同志，政治上麻痹，思想上松懈，疏于防范，被陶林以谈恋爱为诱饵，让其轻轻松松如愿以偿地混入抗大四分校普通科。

在普通科学习期间，陶林觉得张俊亦来自淮安城，模样俊俏且年纪小，涉世未深，容易哄骗，遂以同乡为由，设法与她套近乎、拉关系。殊不知，张俊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政治觉悟非常敏锐，革命警惕性特别强。一开始，张俊念其乃淮安城老乡，遂与之亲密无间，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后来，陶林常在其面前抱怨学校生活艰苦，吃穿不佳，发牢骚、散布反动言论。碍于老乡情面，张俊不以为意，在她看来，在抗大四分校普通科学习，有军装穿无需钱，能饱腹已足矣。然而，久而久

之，陶林言辞愈发露骨，暴露出策反嫌疑。于是，张俊便暗中留意其一举一动。

一次，陶林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悄悄地将一张纸条藏于一块砖头之下。岂料，这一举动被张俊尽收眼底，她立即向学校领导作了汇报。

后经学校保卫部门审查，发现陶林政治上有疑，遂送交淮宝县公安局。为此，张俊被借调到公安局一个多月，专门协助侦破陶林案件，并在调查、侦破、取证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经公安局周密侦查，秘书云深同志反复调查研究，最终拨开云雾，真相大白，陶林确系日本特务机关所派特务。为保卫抗日根据地、惩治汉奸、特务，淮宝县公安局在岔河镇东庵后面，将陶林依法就地处决。

事后，抗大四分校党委专门召开会议，公开表扬了张俊在侦破陶林间谍案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档案资料中有明确的记载）。同时，对张健同志进行了极其严肃的批评。